

从异托邦视角看《我睡了可我的心醒着》中的文化书写

宋平^{1*}

(¹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 妮可·克劳斯的《我睡了可我的心醒着》讲述了女儿继承了已故父亲亚当的公寓后, 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理解过父亲的故事。父亲的公寓构成一个典型的“异托邦”, 浓缩了美国文化霸权与流散犹太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 成为一个围观的文化政治战场。首先, 公寓作为“反霸权飞地”, 使亚当得以在内部空间抵抗美国主流文化的同化, 重构其主体性。其次, 公寓又呈现为一个“补偿性异托邦”, 在流散中承载了被压抑的文化根性与被遮蔽的本真情感。最后, 父亲的朋友波阿兹充当空间意义的传递者, 引导女儿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隔阂, 完成从法律继承人到文化守护者的身份转变。由此, 本文不仅揭示空间在文化政治中的能动性, 也指向一种“睡了心却醒着”的生存策略, 为在全球化语境中, 如何通过构建异质空间, 守护属于自身的文化灵魂给了一个参考答案。

关键词: 《我睡了可我的心醒着》; 异托邦; 文化霸权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7.926>

The Cultural Writing in "*I Sleep But My Heart Is Awak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topia

Song Ping^{1*}

(¹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China)

Abstract: Nicole Krauss' "*I Sleep But My Heart Is Awake*" tells the story of a daughter who, after inheriting her deceased father Adam's apartment, gradually realizes she never truly understood him. His apartment constitutes a typical heterotopia, encapsula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American cultural hegemony and diasporic Jewish cultural identity, thus becoming a microcosmic battlefield of cultural politics. First, as a counter-hegemonic enclave, the apartment enables Adam to resist assimilation into mainstream American culture within this internal space, reconstructing his subjectivity. Second, the apartment functions as a compensatory heterotopia, preserving suppressed cultural roots and obscured authentic emotions in the context of diaspora. Finally, Adam's friend Boaz acts as a transmitter of spatial meaning, guiding the daughter across generational and cultural divides to complete her transition from a legal heir to a cultural guardian. This study not only reveals the agency of space in cultural politics but also points to a survival strategy of "sleeping with a waking heart", offering a reference for safeguarding one's cultural soul in the globalized contex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heterogeneous spaces.

Keywords: "*I Sleep But My Heart Is Awake*"; Heterotopia; Cultural hegemony

作者简介: 宋平 (1999-), 女, 湖北恩施, 硕士,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美国文学

通讯作者: 宋平, 通讯邮箱: 1263481663@qq.com

引言

遗产继承，通常意味着一种延续。即从逝者手中接收物质财产，并由此延续其情感与记忆，在哀悼与缅怀中获得安慰、完整与代际联结。然而，在妮可·克劳斯的“我睡了可我的心醒着”中，女儿继承已故父亲亚当的公寓时，却发现她对父亲的单一认知，呈现出充满疏离与认知危机的局面。而一个陌生男子的出现，则为她真正理解父亲提供了契机，父女之间由此有了新的联结的可能性。

异托邦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空间概念。它与乌托邦相对。乌托邦是不存在的、理想化的完美社会，而异托邦则真实存在于社会之中，却以某种方式偏离、挑战甚至颠覆常规社会空间规则。它们既被主流社会所包容，又以某种方式偏离、挑战甚至颠覆其常规秩序与逻辑，如同镜面一般，映照出社会中的矛盾与张力。克劳斯笔下的父亲公寓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异托邦^[1]。它并非静止、中性的容器，而是一个充满能动性的文化政治场域，浓缩了美国文化霸权与流散犹太身份之间持续不断的微观斗争。文化霸权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核心概念，用以描述统治集团并非仅依靠暴力强制，而更多是通过塑造社会共识、文化价值观与日常实践，使其权威被社会普遍接受为“自然”与“常识”的支配形式。这种霸权渗透于教育、媒体、家庭与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使从属群体在无意识中内化并认同主导阶层的价值体系，从而达成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统治^[2]。

本文以福柯的异托邦为理论框架，对已故父亲的公寓进行深入诠释。首先，公寓作为“反霸权飞地”，探讨亚当如何通过一系列非功利、反消费主义的物品与文化实践，在内部空间实现对美国主流文化同化的抵抗，并完成从外部世界“异乡客”到内部空间“主权者”的身份逆转。其次，公寓作为“补偿性异托邦”的功能，分析它如何为在外部世界被压抑的犹太文化根性与本真自我提供了存续与栖居之所。最后，通过分析陌生男子波阿兹这一关键人物的引导作用，本文将进一步揭示，这个因父亲离世而趋于凝固的异托邦，如何被重新激活，并最终促成女儿从基于法律物权的“外部继承者”转化为认同文化逻辑的“内部守护者”。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旨在揭示，《我睡了可我的心醒着》中的公寓不仅是一个继承的物理对象，更是一个动态的文化战场与身份坐标。它深刻地启示我们，在一个文化交融与张力并存的年代，个体如何通过构建异托邦式的空间策略，在全球化浪潮中守护其文化的灵魂^[3]，实现一种“我睡了可我的心醒着”的生存智慧。

1 反霸权飞地：“异乡客”亚当在异托邦的文化抵抗

对于经历过漫长流亡与迫害的许多犹太人而言，二十世纪的美国常象征着希望之地：它不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避难所，更代表着自由、安全与重建生活的可能。然而，这片被寄予厚望的“新大陆”，在提供生存空间的同时，也悄然构筑起一个隐形的文化战场。随着移民及其后代逐渐嵌入美国社会的肌理，一种深刻的代际裂痕开始显现——老一辈犹太人往往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对民族身份抱有难以割舍的执念；而年轻一代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成长，鲜少直接背负历史的创伤，因而更易于接受主流文化的召唤，对本民族的传统表现出疏离甚至背弃。这种文化认同上的分化，逐渐固化为一种“犹太父母，美国儿女”的典型格局，家庭内部的语言习惯、饮食传统、价值观念乃至情感结构，都成为两种文化力量相互拉扯的微观现场。

故事里的父女同样如此，父亲在特拉维夫长大，后陪女儿在纽约念完大学，随后返乡。“自我母亲去世后，他就带着我离开了这儿。他在纽约找了份教书的工作，我也开始上学……我成了地道的纽约人，他却永远只是个异乡客。”^{[4][43]}地道的“纽约人”、永远的“异乡客”表明女儿已经将纽约的文化霸权内在化，而父亲坚持以“异乡客”自处，显示出对同化的审慎距离。在纽约，亚当是格格不入的“异乡客”，是主流文化定义下的客体。这种代际差异并非偶然，可从美国文化霸权持续运作中得到解释。主流社会通过教育体系、媒体叙事和消费主义逻辑，将一种去历史化、去民族化的“美国性”塑造为普世标准，使得少数族裔的年轻一代在追求“成功”与“融入”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内化了这套价值秩序。然而，这种看似平滑的文化更替，实则伴随着深刻的精神代价与身份困惑。而这间公寓，正为亚当这一代犹太移民提供了抵御文化消解、安放其偏离身份的庇护所。

首先，亚当的公寓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充满了父亲生活的痕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异托邦。对于亚当这位在文化上拒绝被美国主流同化的“异乡客”而言，这间公寓远非一个简单的遗

产或居所，是他在全球化语境下主动构建的一个反霸权飞地，一个用以地域文化同化认同的微观政治战场，可视为一种现实的他处是与乌托邦相对应的“实际存在的乌托邦”。父亲的公寓本身就宣告着对文化霸权的反抗，此地的权力运作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离。在公寓之外如以纽约为代表的公共空间，权力运作遵循的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描述的“规训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是外向的、压迫性的、以同化为目的的^[5]。亚当作为犹太移民和“异乡客”，始终处于主流社会的“凝视”之下。他的口音、饮食习惯、文化表达都被置于无形的审视中，并被不断地与“美国规范”进行比较、评判。这种凝视迫使他进行自我审查，戴上“严肃、自律”的人格面具，以符合外界期待，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而在公寓里，“凝视”的权力被彻底反转。亚当成为了空间的凝视主体。他的审美、他的记忆、他的文化偏好构成了空间的主要法则。这里没有外部的评判标准，只有他自己的“规范化”逻辑。那些在外部被视为“花里胡哨”、“过时”的物件，在这里被奉为主体性的象征。权力从“被看”转变为“看”，从被规训转变为自我立法。此外，公共空间如学校的布局和使用规则是由主流文化设定的。亚当的身体需要适应这些规则——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如何举止得体。他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规训的、不自由的。而在公寓内的组织逻辑完全服务于亚当的个人历史与文化认同。物件的摆放不遵循任何效率或实用法则，而是遵循自己的意愿。

具体到物品来说，亚当公寓的抵抗性物化于其精心收藏的各类物品之中，这些物品共同构成了一套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沉默批判^[6]。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深植于实用主义哲学，强调物品的功能性与效率。而公寓中充斥的“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与“五颜六色的碗碟”，其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其非功利性。而是为了“有意义”，其意义源于个人记忆与审美选择，构成了对工具理性的直接挑战。此外，美国消费文化的核心动力是“逐新”，通过不断制造欲望与淘汰来维系。与此相反，公寓中“褪了色的”地毯与“历次旅行的纪念品”，共同构建了一套反消费主义的叙事。这些物品的价值并非来自市场的交换逻辑，而是源于其承载的个人历史与时间沉淀所形成的光晕^[7]。它们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抗拒着消费主义下的均质化与可替代性。而且，美国大众文化倾向于生产易于消遣、鼓励被动接受的文化产品如短视频、流行音乐。而父亲公寓中的“歌剧唱片”与“一排排的书”则代表了另一种深度、专注的文化模式^[8]。“翻开着的乐谱”尤其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亚当从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转变为需要投入心智与情感的主动文化实践者^[9]。当然。抵抗不仅存在于视觉物品，也弥漫在空间的感官氛围中。厨房里飘着的“香料的的味道”，是一种无法被忽视的身体性存在。气味无法像物品一样被轻易收起，也无法像音乐一样被关闭；它通过最原始的嗅觉，渗透并弥散空间。这股气味与标准化、速食化的美式快餐文化形成尖锐对比，它以最直接的方式证明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文化独特性的生活现场，而非一个“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的临时居所。

作为一个运转有效的异托邦，亚当的公寓使他得以由公共领域中的“异乡客”转向私人领域的文化“主权者”。通过一系列非功利性、反消费主义且需要深度参与的文化实践，他将这个空间打造为一个坚实的反霸权飞地。这里不仅是他个人记忆的博物馆，更是一处积极抵抗文化同化的精神堡垒。正因如此，当女儿进入这一场所时与室内的空间规范发生直接碰撞，便有了第二章的文化存续讨论。

2 异托邦的补偿：犹太文化根性的存续

我们跟随者女儿这个霸权内化者走，除了物品之外，这所公寓还涵盖着异托邦的补偿作用，承载着犹太对“根”的追寻。

女儿起初将父亲的房间预设为一个“访问学者”的备用房，这是一种暂时性、可替换的场所。暗示此地不需要承载沉重的私人情感和文化内涵。“我一直以为他住的房子是大学借给他的，就是那种经常给访问学者住的备用房间，不带任何个人色彩，里面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橱柜里有盐，但绝不会有橄榄油；厨房里有刀，但什么都切不动^{[4]39}。”在她的想象中，父亲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文化根系的复杂个体，而被简化为一个功能性社会角色。但是犹太的无根性和漂泊经验，恰是“地道纽约客”所未纳入视野的部分。女儿所认同的那种“标准化、无个性”的公寓，在犹太漫长的流散史中，代表了一种以放弃独特身份来换取安全入场券的契约。里面“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是美国对犹太人的态度——你可以在这里生存，但我们不关心你如何生活。我们给你公民的身份，但通过是你也要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访问学者”也精准地呼应了犹太人在

外的“客民”身份——永远只是暂时的居住者，不被真正接纳，随时可能被驱逐。那把“什么都切不动”的刀，象征着一种被允许存在、却被剥夺了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生存状态。最后说的橄榄油，从照亮圣殿的金灯台到纪念马加比奇迹的光明节，从安息日烛光的燃料到日常饮食的基底，橄榄油以其符合洁食标准的特性，深度嵌入犹太人的生活仪式与节庆循环。然而深受美国文化内化的女儿却认为父亲厨房“绝不会有橄榄油”，这种认知错位暴露出文化霸权对少数族裔生存经验的系统性抹除。当她将橄榄油简单归类为可有可无的调味品时，本质上是否定了犹太延续的文化记忆，这瓶看似普通的液体，因而成为测试文化认同的途径。正因亚当在外部世界长期身处这种“无根”和“临时”的状态，他才需要并创造了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公寓。这个公寓不是“借来的”，里面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有着他最爱的东西。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补偿了他在美国被剥夺的“文化根性”与“生活主权”。

之后女儿在房间里发现的照片说明了“异托邦”如何补偿了个体在文化霸权下被压抑的自我^[10]。“我开始感觉到那张熟悉的脸庞却越发陌生了，好像这个轻松快乐的年轻人跟我父亲毫无关系，因为我的父亲哪怕是在找乐子的时候也总是自律的、严肃的。在最后一张照片里，他张开双臂，哈哈大笑^[4147]。”在纽约，作为一位犹太移民、学者和单身父亲，亚当必须严格遵守主流社会的规则，他的“自律”与“严肃”是一种保护色，是为了在异质文化中维持尊严、获得认可、并成功抚养女儿所不得不佩戴的人格面具。他的快乐因此变得克制、有限，始终无法完全放松。而在这所公寓里女儿看到照片中父亲“张开双臂，哈哈大笑”，显影出他更本真、更完整的自我。那个“哈哈大笑”的形象，正是他在属于自己的故乡中得到补偿的、被解放的灵魂。在故乡的文化场域里，他无需扮演那个严肃的异乡客，他可以卸下重担，重新与那个快乐、奔放的自我联结。这些照片证明公寓这个异托邦的另一补偿是让被主流社会压抑的、碎片化的自我，重新变得完整和鲜活。反观女儿，她已将纽约的社会规范视为理所当然，文化霸权剥夺了人们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她认为父亲那副“严肃、自律”的面具就是他的全部。她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父亲拥有一个与纽约语境下截然不同的、鲜活的自我。这在深层意义上表明，她已被霸权逻辑所同化，默认了在纽约的压抑状态是唯一的、正常的生存方式。女儿的困惑，则像一面镜子，反射出霸权如何通过塑造认知，将对压迫的形象误认为人性的本质，从而使得对压迫的反抗和对真实自我的追寻，在亲人眼中反而变得“陌生”起来。

这种文化霸权使得代际之间出现隔阂，所以女儿后面说，“这是我父亲的地盘，毫无疑问，这里全都是他最爱的东西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家，而我从小长大的那间公寓只不过是他在离开这里时暂住的地方^[4144]。”在特拉维夫这个公寓里，这里的规矩比如摆什么、听什么、吃什么全由他定。这个地盘是他的独立王国，他在这里从被规则管束的“异乡客”，逆转成了制定规则的主权者。对女儿而言，有亲人在的地方就是家，纽约的家是血缘之家。而对亚当而言，真正的家是文化之家。在这里，他不需要解释我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整个空间都在替他回答，这里才是他作为亚当这个人，可以自由呼吸的灵魂归属。父亲他清醒地抵抗着这种同化，而女儿不理解表明文化霸权把最亲的父女，变成了彼此熟悉的陌生人^[11]。女儿说父亲“放弃了用希伯来语跟我说话”，他的放弃可视之为对父女间文化距离的策略性让步。这实则是文化权力关系发生重构的显著标志。希伯来语作为神圣语言，在传统犹太文化中占据着神圣的符号支配地位。它不仅是宗教仪式的媒介，更是连接犹太民族与神圣历史的纽带。作为文化传承的承担者，父亲通常被期待通过希伯来语传递民族记忆与价值规范，当父女间的日常交流不再使用承载着民族集体记忆的语言时，文化连续性的链条出现了松动。这一放弃意味着传统文化权威在文化霸权冲击下的退场^[12]。然而这种语言上的退却反而催生了新的文化抵抗形式，即这所公寓，他在语言之外建立起一个文化存在的异托邦^[13]，证明文化身份可以超越语言的界限而持续存在，让空间发声^[14]。

回到文章标题，“我睡了可我的心醒着”，“我睡了”象征着亚当在纽约主流文化中的生存策略。作为一名犹太移民，他必须戴上“严肃、自律”的人格面具，压抑自己本真的文化性格与情感，如同在文化上陷入了一种“沉睡”或蛰伏状态。“可我的心醒着”则揭示了这种“沉睡”表象下的真相。他的心——他对犹太文化的归属感、他的民族记忆、他未被同化的本真自我——从未沉睡。这份清醒的“心”，最终物化、具象为他在特拉维夫的那所公寓。公寓里的一切都是他清醒的“心”在跳动、在言说的证据。肉身虽逝，但通过这个空间，他文化的心脏依然在搏动。

3 异托邦的补偿：犹太文化根性的存续

在父亲去世后，公寓虽完整保留了父亲抵抗文化同化的诸多物证，却因主体的缺席成为一个悬置于时间中的异托邦。遗嘱执行人交付的钥匙与波阿兹的出现，打破了静止，使该空间再度被调动为动态的、可被感知和进入的生活现场。波阿兹由此引导女儿重新认识父亲，并最终促成文化的代际传递。

波阿兹的行为直接演示了异托邦的“使用规则”。当女儿“第一次打开这间我之前并不知晓的公寓的大门时，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我仿佛上下颠倒地看着父亲的人生。”她所感受到的惊讶不安与背叛的刺痛，宣告了父亲拥有一个完全独立于家庭与社会角色之外的、未被主流价值观同化的真实自我。这对女儿而言，是一次文化霸权的失效。第二次冲击则源于波阿兹的动态演示，是文化权力关系的直接对调。“我在客厅里看着他熟练地切菜、打蛋，又在冰箱里东翻西找。看着他如鱼得水的模样，我觉得烦躁。”^{[4]42}好似主人归来，这种熟练绝非客人的礼节性拘谨，而是一种深植于日常的、肌肉记忆般的自如。他的行为轨迹，完美复刻了父亲在此地的生活印记。那些在女儿眼中仅是“静止的物件”的厨房、冰箱、炉灶，被他一系列流畅的动作重新赋予了功能性与生活应有的温度。空间因他而“活”了过来，但这“生命”却与女儿无关。由此，女儿所感受到的“烦躁”，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陌生闯入者的不快。“烦躁”的深层根源是霸权地位遭遇动摇时所产生的排异反应。父亲通过遗嘱执行人授予她钥匙，确立了她在法律与主流秩序下的合法所有权。然而，他“不留字条”的沉默与只让她“去看看”的安排，恰恰悬置了文化的解释权与主导权。这意味着，女儿被赋予的是进入权，而非定义权。因此，当波阿兹出现时，她基于法律文件所建立的“我才是主人”的心态遭到了彻底的解构。她的烦躁，正是她所代表的权利，在遭遇一个具有完整性与自足性的“反霸权”空间时，所产生的权力被剥夺感与认知危机。

波阿兹的闯入，不仅激活了空间的物理生命，更激活了其挑战与颠覆主流霸权的文化政治功能^[15]。因为女儿的烦躁，并未持续下去，随着她持续观察与内心反思，她不再试图用自己熟悉的规则去“征服”这个空间，而是转为遵循其内部规则。从刚开始女儿会问波阿兹是谁、来做什么，到之后的“我什么也没问，只是摆好餐桌。”^{[4]49}意味着她停止对话语权的挑战，停止了对波阿兹存在合法性的霸权式质询，不再以所有权逻辑去审视和挑战这个空间的内部秩序。取而代之的是她主动“摆好餐桌”，并开始“猜想父亲以前坐的是哪把椅子”。这一系列行为，标志着她从空间的审视者与批判者，转变为试图融入其文化仪式的参与者。更进一步看，波阿兹及其所代表的原生文化语境，这里的人“说着和我父亲相同语言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都让我得到了安慰。”^{[4]43}，为她提供了在父亲缺席后的巨大虚空中的“安慰”。这个“安慰”那个曾让她感到背叛与不安的、作为反霸权飞地的异托邦，开始向其展现出强大的情感慰藉的力量。她最初所依附的、那个被主流文化霸权精心塑造并被她内化的父亲幻象破灭后^[16]，正在被更真实、更复杂、更具生命力的波阿兹所填补。波阿兹扮演了父亲的替身与文化先导的角色，复刻着父亲在此地的生活轨迹。女儿从波阿兹及其所代表的语言环境中获得的“安慰”，是她对父亲设立的这套异托邦权利运作机制的接纳。至此，异托邦对她而言，不再是那个冰冷、对峙的“他者”空间。通过波阿兹她开始思考是继续固守外部世界赋予她的“合法主人”的虚名，还是谦卑地走入这个内部，成为其文化的新的理解者与继承人。

最后，波阿兹促成女儿转变为新一代守护人——女儿明白了这是父亲的安排。“这一切也许是我父亲的安排……我的父亲也许还怕麻烦地请了他这位老朋友来照看我，或是来告诉我什么，不管多么隐晦，反正是向我传递某种信息或者信号，告诉我他不在了我该怎么做。”^{[4]49}当女儿停止追问波阿兹“你是谁”的霸权式质询，转而思考“父亲想通过你告诉我什么”时，她便从法律的产权人，转变为了文化的继承者。异托邦是一个充满能动性的权利场域。它拥有一套区别于外部主流社会的、独特的规则体系与准入机制。女儿对“安排”的承认，意味着她自愿放弃了基于物权的外部主宰权，选择遵从从空间内部生成的、由波阿兹所体现的文化引导权。这标志着异托邦的权利运作机制，成功地吸纳并规训了其法定的新主人。从文化霸权的视角看，女儿的顿悟是其内心霸权结构彻底崩解的证明。霸权通过将主流价值观自然化为“常识”来运作。她最初所持有的“我才是空间唯一合法主宰”的信念，正是此种霸权逻辑的内化。然而，当她并愿意接受这份来自边缘文化代表波阿兹的指引时，她便完成了一次静默的权力让渡。她主动解构了内心的文化中心主义，完成了她从“外部世界的继承者”到“异托邦内部的共生者”的身份重构。父亲的

异托邦取得了终极胜利。它没有被她所代表的主流文化霸权吞噬或同化,反而成功地将她转化为其文化血脉新的守护者。她手持法律的钥匙,也确保了那片用以抵抗同化的精神飞地,得以在动态的传承中延续其生命力。结尾波阿兹睡觉时“我突然很怕打搅到他……如果我吵醒了他,也许就会打破某种平衡,导致某种东西永远消失或者静默了。”^{[4][55]}波阿兹的沉睡,象征着这个异托邦原生文化逻辑在一种不受打扰的、本真的状态下自主运行。这种状态是抵御文化霸权同化力量的屏障。一旦被她所代表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喧嚣“吵醒”所惊扰,这个空间赖以生存的独特灵魂——那种非主流的、静谧而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就可能“永远消失或者静默”。女儿所畏惧打破的“平衡”,正是主流世界与异托邦之间、法律所有权与文化解释权之间那道无形的界限。她的“恐惧”,是一种源于深刻理解的敬畏,意味着她已将守护这个空间的文化自治权视为己任。

文章标题《我睡了可我的心醒着》中“我睡了”也代表了女儿在文化霸权浸润下的“无意识”状态。她内化了纽约的价值观,对父亲的文化根脉和内在自我视而不见,这是一种精神与文化感知上的“沉睡”。“可我的心醒着”表示她内心深处潜藏的理解与共情能力。尽管她的显意识在“沉睡”,但她作为女儿和犹太人的“心”始终保有觉醒的潜能。在进入父亲的公寓、遇见波阿兹之后,她的这颗“心”被逐渐唤醒,最终实现了对父亲、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深刻“觉醒”。

4 结语

《我睡了可我的心醒着》中父亲公寓是一个充满能动性的文化政治场域。作为“反霸权飞地”,公寓是父亲亚当对美国文化同化进行抵抗的微观战场。通过一系列非功利性、反消费主义的物品,他成功地将自己从被主流定义的“异乡客”,逆转为此地拥有文化阐释权的“主权者”。公寓有效地补偿了亚当在外部世界被剥夺的“文化根性”与“生活主权”。它不仅存续了其犹太文化身份,更庇护了那个在纽约“严肃”面具之下被压抑的、本真而快乐的自我,实现了其完整人格在空间中的复归。后面通过波阿兹这一“引导性”角色的介入,这个濒临凝固的异托邦被重新激活。波阿兹演示了空间的使用规则,成功地引导女儿完成了从基于法律物权的“外部继承者”到认同文化逻辑的“内部守护者”的身份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异托邦的终极胜利——它不仅抵御了同化,更通过代际传递获得了新生。

在一个文化交融又充满张力的世界里,这所公寓向我们展示了另类的生存智慧,对于主流文化,未必需要轰轰烈烈地对抗或全盘接受,更有效的方式,或许是像亚当一样,用心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所有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身份碎片化危机的人们,恰恰需要保持这种“睡了却醒着”的状态,即身体可以适应,但文化的灵魂永远清醒。

参考文献:

- [1] Foucault M. 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J]. Diacritics, 1986, 16(1): 22-27.
- [2]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M]. Hoare Q, Smith G N, trans. & ed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 [3] 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M]. Cambridge: Blackwell, 1996.
- [4] 妮可·克劳斯. 成为男人[M]. 王一凡, 译.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4.
- [5]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 [6] 鲁傲雪. 福柯空间理论视角下的乌托邦批判[D]. 郑州: 郑州大学, 2021.
- [7] Hetherington K. The Badlands of Modernity: Heterotopia and Social Ordering[M]. London: Routledge, 1997.
- [8] Dehaene M, De Cauter L, eds. Heterotopia and the City: Public Space in a Postcivil Society[M]. London: Routledge, 2008.
- [9] Topinka R J. Foucault, Borges, Heterotopia: Producing Knowledge in Other Spaces[J]. Foucault Studies, 2010(9): 54-70.
- [10] 马汉广. 福柯的异托邦思想与后现代文学的空间艺术[J]. 文艺理论研究, 2011(6): 40-45.
- [11] 朱荣华. 《霍默与兰利》中的异托邦叙事[J]. 当代外国文学, 2018, 39(1): 5-12.

-
- [12] 方成. 杰克·伦敦小说中的文化霸权——暴力及其导致的亚文化群体心理格式[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9): 58-62.
- [13] 施庆利. 福柯“空间理论”渊源与影响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0.
- [14] Bendixsen S, Witteborn S. Migrant Heterotopias: Religious Spaces and Political Visions in Berlin[J]. Space and Culture, 2011, 14(1): 76-93.
- [15] 黄漪澜, 林元富. 危机·偏离·幻觉——杰斯敏·沃德小说中的汽车异托邦书写[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 43(2): 12-18.
- [16] 罗文敏, 肖佳昕. 论《苦妓回忆录》的异托邦叙事[J]. 当代外国文学, 2024, 45(3): 111-117.